



屈大均与岭南文化自觉

□左鹏军

传播自觉： 岭南文化的有效传播

屈大均对于岭南文化的一往情深,不仅在于朴素的故土情结、乡邦情怀,而且在于从中华文化角度甚至一定的世界文化角度对于岭南文化的挚爱和信心。从而使屈大均的岭南文化自觉,在一定意义上获得了由岭南而观察和感悟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普遍性价值。这种文化意识的最突出表现,就是屈大均对于岭南文化的有意识传播。

屈大均对于岭南文化的有意识、有效性传播,对于岭南文化所具有的岭南性与超岭南性的完整性、一体性认识和把握,使岭南文化得到江南、中原等主流文化地区杰出人士的深切了解和深度认同,并产生了显著的海外影响。这是岭南文化发展演进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岭南文化在中华文化整体格局及其多种地域化形态中得以自立、获得突出地位、产生较大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

屈大均与同时期或稍后的江南知名人士顾炎武、潘耒、朱彝尊、费锡璜等的密切交往和深度认同、同声相求和意气相投,表明了其传播岭南文化的自觉行动及有效回应,促使岭南文化在岭南以外的广阔地区得到传播并产生显著影响。

朱彝尊在《〈九歌草堂诗〉序》中说过:“予友屈翁山为三闾大夫之裔……三闾当日,方叹恨国人之莫知,今海内之士无不知有翁山者,则所遇又各有幸不幸焉。呜呼!难言矣……世徒叹其文字之工,而不知其志之可悯也。予故序之,以告后之君子诵翁山之诗者,当推其志焉。”这既是他们友谊的形象记录,也是由于屈大均的友朋交往而使岭南文化在荆楚、吴越、燕齐、秦晋等地区得到传播、产生影响的直接证明。

而生活于清乾隆、雍正至道光时期自诩狂名、睥睨一切、敢于写下“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咏史》)诗句的龚自珍,于夜深人静之时在北京偷偷地读当时已被列为禁书的屈大均诗文,并写下这样的诗句:“灵均出高阳,万古两苗裔。郁郁文词宗,芳馨闻上帝。”“奇士不可杀,杀之成天灾;奇文不可读,读之伤天民。”(《夜读番禺集,书其尾》)恰恰是屈大均著作在被专制政府禁毁的情况下,仍然在一些地区、一些人士中间流传并产生影响的有力证明,也似乎应和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

屈大均尽管主要生活在清代初年专制压抑、血腥残暴,汉族士子岌岌可危、动辄得咎的不幸年代,但仍然是一个敢于表达自己爱恨情仇的慷慨磊落之士。他在《鲁连台》诗中写下的“从来天下士,只在布衣中”;在《春山草堂感怀》诗中写下的“半生游佚误,一代逸民存”“慷慨干戈里,文章任杀身。尊周存信史,讨贼作词人”,就是大胆的告白和勇敢的宣言。恰恰是缘于这样的道德操守、学术底蕴和价值追求,使屈大均对于岭南文化的自觉建构,表现出具有象征意味和时代价值的深刻持久之处。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屈大均对于岭南知识的建构和对于岭南文化尤其是岭南精神和岭南形象的守护、弘扬与传播,是完全出自个人自主自愿的,而非官方或其他任何势力驱使的;是有着深刻的思想寄托和诗性情怀的,而非仅仅知识的一般记录和平淡介绍的;是产生于政治动荡、政权鼎革、岭南文化乃至中华正统文化面临空前危机之际的,而非所谓“盛世修史”“歌舞升平”的;是有着深切的切肤之痛、感同身受的,而非闲情逸致、隔岸观火的是;出于“非正统”角度的,而非出于“正统”角度的;是属于岭南区域的地方性的,而又并非仅仅属于岭南的地方性的,更有着关乎整个国家民族、中华文化的未来前途和出路的。

由于屈大均的自觉坚守、倾情投入、笔随心动,从而在时局动荡、政权交替的异常艰难之际,将岭南知识的谱系构建、岭南思想的汇聚提炼、岭南精神的时代品格、岭南形象的塑造彰显、岭南文化的传播认同提高到系统化、自觉化的新阶段,从而使岭南文化的声音更加响亮辽远,在中华文化整体格局中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并得以牢固地确立,并对其后的岭南文化走向、建设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促进了此后岭南文化的全面繁荣与持续发展,为岭南文化深刻影响和有力引领中国文化走向新时期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准备了条件。

因此,说屈大均是岭南文化走向全面自觉的杰出代表和显著标志,不仅于史有据,而且当之无愧。

(作者是珠江学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位于广州市番禺区新造镇思贤村思贤大街的屈氏大宗祠 图/番宣

知识自觉:岭南知识的系统建构

交代:《“广东新语”一书,何为而作也?屈子曰:予尝游于四方,阅览博物之君子,多就予而问焉。予举广东十郡所见所闻,平昔识之于己者,悉与之语。语既多,茫无端绪,因论次之而成书也。”又说:“吾闻之君子知新。吾于《广东通志》,略其旧而新是详,旧十三而新十七,故曰‘新语’。《国语》为《春秋》外传,《世说》为《晋书》外史,是书则广东之外志。而广大精微,可以范围天下而不过。知言之君子,必不徒以为可补《交广春秋》与《南裔异物志》之阙也。”

《广东新语》成书于康熙十七年(1678),当时屈大均已四十九岁。屈大均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和用意来撰写这部著作的,其江南好友潘耒(1646—1708)在为此书所作序文中曾说过:“于是考方輿、披志乘、验之以身征、征之以目睹、久

而成《新语》一书。其察物也精以核,其谈义也博而辨,其陈辞也婉而多风。思古伤今,维风正俗之意,时时见于言表。游览者可以观土风,仕宦者可以知民隐,作史者可以征故实,摘词者可以资华润……善哉,可以传矣!”在如此翔实而细致的描摹中,可见屈大均以严谨态度和学术方式、以存信史心愿和执着精神撰写这部著作的状态与心态。

尽管在此之前已经有了多种关于岭南文化的方志、史乘著作及相关记载,但是,对于岭南知识的系统建构、完整表达和全面呈现,屈大均还是第一人。因此,以《广东新语》为中心,加之《广东文选》《广东文集》及其他诗词、文章,构成了屈大均关于岭南地方性知识自觉构建的总体框架,形成了远绍昔贤、启迪后人的岭南知识谱系。

思想自觉:岭南思想的价值凝练

将这部书仅仅作为补充以往史乘之所阙、之不足的一般知识性读物,而是满怀深情、别有寄托。

屈大均《广东新语》的思想用意和价值选择,在该书的一些条目中可以相当分明地看到。如卷九《事语》论“贪吏”云:“民贾于官,官复贾于民,官与贾固无别也。贾与官亦复无别,无官不贾,且又无贾而不官。民畏官亦复畏贾,畏官者,以其官而贾也;畏贾者,以其贾而官。于是而民之死于官之贾者十之三,死于贾之官者十之七矣。嗟夫!在昔国之富藏之于民,今也藏之于官,复藏于官而贾者,藏于贾而官者。民日穷而盗贼日炽,其祸不知所底。非有圣君贤相,端本澄源,以节俭为之倡率,禁难得之货,明贪墨之刑,则粤东一隅,何以有匹夫匹妇之性命也哉?噫!”对官场状况、官商勾结一起作害百姓现实的揭露批判,都是切中时弊、深得民心之论。

又如卷十一《文语》即以“广东文集”条开端,中有云:“嗟夫!一国之人文,天下之人文也。知天下于一国,知一国于一人。此一人者,其出则必如文苑,处则必如文恭者也。典型既往,后学无师。吾安得不为斯文之绪有深虑乎……予将终身以之,若愚公之徙太行,精卫之填东海,不以其力之不足而中辍也。知者鉴诸!”对于广东文苑、学术传统和人文精神的守护、传承之意,自己编纂《广东文集》的使命担当、时代责任、坚定信心,都如此鲜明、坚定地表现出来,可见他由岭南文化而天下人文、由岭南文化而天下文化的思想自觉和时代使命。

从《广东新语》的一些精彩片段、字里行间可以相当分明地感受到,这是一部具有自觉而深切的思想性和人文性、主观性和诗性特征的著作。而这,正是《广东新语》与一般的百科全书及其他工具书的重大区别之所在。屈大均所

精神自觉:岭南精神的时代彰显

种种作为的揭露、斥责与批判。

卷二《地语》“迁海”条云:“粤东濒海,其民多居水乡……至是飘零日久,养生无计……或合家饮毒,或尽帑投河,有司视如蝼蚁,无安插之恩;亲戚视如泥沙,无周全之谊。于是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数十万计。民既尽迁,于是毁屋以作长城,掘堊而为深堑……民有阑出咫尺者,执而诛戮;而民之以误出墙外死者,又不知几何万矣。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可见“迁海”之令的密集严格与接连不断,也可见这一政策的战略性质和强迫方式,尤其是这道命令给广东沿海居民带来的巨大动荡和种种不幸。这与某说是如实记载、细致描述“迁海”令的由来和后果,不如说是秉笔直书、存其信史精神的史家之笔和含有深意、怀有寄托的诗家之笔的完美结合与相得益彰。

又如卷二《地语》“澳门”条云:“番人列置大铜铤以守。其居率为三层楼,依山高下。”此语恰可与屈大均写下的关于澳门等地的诗歌相参观。其《澳门》诗中說:“广州诸舶口,最是澳

形象自觉:岭南形象的自觉塑造

《广东新语》卷八《女语》中,记载了多位在清军入粤过程中的被害女性,甚至描述了许多令人感到可怕的恐怖细节。这样的选择和处理,除了表达屈大均对于这些被侮辱与被残害女性的同情悲悯,对于占领者、施戮者罪恶行径的揭露声讨之外,还有着表现节烈精神、树立岭南女性忠孝、英勇形象的深层含意。

而在卷九《事语》“琼人无仕元者”中所记:“宋末,琼州人谢明、谢富、冉安国、黄之杰,从安抚赵与珩拒元兵于白沙口。皆被执不屈以死。于是终元之世,郡中无登进士者。明兴,才贤大起,

值今年屈大均(1630—1696)逝世330周年之际,回顾岭南文化的历史变革、时代演进和岭南文化研究的学术史历程、时代转换,就会发现,屈大均的成就与贡献、地位与影响,不但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变得黯淡遥远、模糊不清,反而在时代的变革与文化的演进中历久弥新、熠熠生辉。

屈大均取得的多方面成就和对岭南文化变革作出的多方面贡献,在岭南文化史上的标志性意义,已是公认的文化史和学术史事实。最直接也最明确地说,就是:屈大均是岭南文化走向全面自觉的标志。

这种标志性意义既体现在屈大均对于岭南文化的多方面贡献上,也体现在他对于岭南文化的开拓性研究上,更体现在他进行历史回顾与文化前瞻的时候所产生的历史感和现实感以及二者的交汇与辉映之中。

岭南作为中华文化整体格局中的一个文化区域,地方性知识的建构在作为文化区域的“岭南”的形成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地位。假如没有尽可能系统而完善的地方性知识建设,包括岭南文化在内的区域文化,是不可能获得成立的资格的。从历史过程和基本事实来看,至迟从汉代开始,岭南知识的陆续表达、构建就已经开始进行,并逐渐有了长时期的积累,为后来的承续和丰富、充实和完善打下了不可或缺的基础;但是应当看到,只有到了屈大均出现,岭南知识的建构才走向了全面自觉的阶段,才具有了文化自觉的意识和水平。

屈大均对于岭南知识的自觉建构,最集中地表现在笔记体著作《广东新语》的撰著之中。他在该书的《自序》中特意

屈大均并没有满足、止步于对于岭南知识的一般建构和呈现、陈述与介绍,而是有着更深一层的对于岭南优秀思想传统、价值观念的关注和发掘、汇聚和提炼。而其思想核心,就是在当时鼎革变迁、王朝更替之际,对于以儒家正统思想文化观念、道德操守、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的守护、表达与延续,在正统文化遭遇冲击、面临危机的危险时刻,敢于发出既属于岭南、更属于中华的正统思想观念和价值认同,从而将岭南文化的思想内核、价值取向与整个中华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岭南思想获得了传承中华文化、守护中华文化、发扬光大中华文化的普遍性意义。

关于《广东新语》的写作用意,屈大均在《自序》中明确说过:“是书则广东之外志也。不出乎广东之内,而有以见夫广东之外。虽广东之外志,而广大精微,可以范围天下而不过。”可见他并不

屈大均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政治动荡、民族冲突、政权更替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战争与血腥、流离与死亡的兴亡交织的时代,也是一个考验所有官员士子尤其是汉族官员士子的出处、选择、去取的改政朔、易服色的变革时代。每当这样的时代,总有一些意料之中和意想不到的分合聚散、分裂重组,也总有一些思想、道德、精神、价值矛盾与冲突被集中显现和迅速放大。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对自己的身份、处境和命运都异常清楚,对本人与当朝政治关系认识得异常清楚,并早已下定决心、作出“布衣”“逸民”选择以自守的屈大均,对于岭南知识的建构,就不可能是非乱世时代、平常日子的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介绍或陈述、呈现、展示,而是自觉地、必然性地带上了特有的时代气息、浓重的情感倾向和明晰的精神向往,而且这一切都完全是出自屈大均清醒而深刻、果敢而坚决的精神自觉。

《广东新语》中的一些条目就集中反映了这种清晰的时代文化气息和高度的精神自觉。比如:卷七《人语》“梅

在屈大均的文化观念和思想意识、学术著述和诗词创作中,不管是对于岭南知识的自觉构建,岭南价值的思想凝练,还是对于岭南精神的时代彰显,实际上都指向了一个更加深厚而持久、辽远而开阔的方向,即岭南形象的自觉塑造。

岭南形象的塑造,从不自觉到自觉、不主动到主动、不积极到积极,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积累和演进过程。这是一个逐渐走向真实化、正面化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有亲切感、家园感的过程。只有到了屈大均出现,岭南形象的塑造才进入了自觉而主动、积极而真切的新阶段。